蘇聯先進科學

自然地理學和經濟地理學問題討論總結

蘇聯“哲學問題”編輯部

世界上沒有任何其他的國家像蘇聯一樣，爲科學（包括地理學在內）的繁榮創造了這樣的非常有利的條件。我們國家採取了廣泛的措施，全面地研究我國自然地理條件，以便在國民經濟中最合理地利用這些條件。

在蘇維埃政權年代裏建立起來的中央與地方的研究所與科學研究機構，以及大批的考察隊，進行了對蘇聯各個地區及其經濟的、自然的條件和資源的綜合研究。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年代裏，蘇聯學者們進行了對北極地帶、中亞細亞人跡罕至的沙漠與山地以及我國周圍海洋的地理調查；發現了極高的山峯、新的山脈、冰河等等。在我們廣大國家的地圖上再沒有“空白點”了。蘇聯地理學家繪製了新的一般性的和專門性的地圖、地圖集，撰寫了一系列的專門科學論文，其中有許多獲得了斯大林獎金。

我們也進行了培養自然地理學和經濟地理學各領域內的專門人材的巨大工作。

由於共產黨和蘇維埃政府的不斷關懷和支持，自然地理學和經濟地理學得到了不小的成就。

但是，從擺在他們面前的巨大任務來看，蘇聯自然地理學和經濟地理學的成就還是十分不夠的。

我們刊物上所討論的自然地理學和經濟地理學問題，也曾在蘇聯科學院地理學研究所和加盟共和國科學院的學術委員會上、在許多大學及師範學院地理學系的學術委員會上、在全蘇地理學會及其各地分會中研討過。同時，自然地理學和經濟地理學方法論的問題也在“蘇聯科學院院報”

（地理學叢刊）、“全蘇地理學會會刊”以及其他刊物上討論過。誠然，“蘇聯科學院院報”（地理學叢刊）上的討論在1952年就結束了，編輯部並沒有作出結論。“全蘇地理學會會刊”的編輯部也沒有對討論的問題發表確定的意見。

所開展的討論不僅揭露了自然地理學和經濟地理學領域中的科學研究工作嚴重地落後於共產主義建設的實踐，而且也揭露了這種落後性的基本原因。

蘇維埃地理學者還沒有充分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來研究自然地理學問題。在個別蘇維埃地理學者的著作中還沒有克服資產階級方法論的影響，因而不能不影響到他們的研究成果。

這次討論深刻地批判了A.A.格利高里也夫院士著作中所犯的理論上的錯誤，指出了在他的著作中存在着毫不反映自然地理環境真實發展的不合實際的公式。同時在討論過程中也指出了，A.A.格利高里也夫院士對許多自然地理學的問題的提法是正確的。A.A.格利高里也夫院士的功績就是在自然地理學中應用地球物理學和地球化學的方法，並且利用這些科學的資料。他十分正確地指出自然地理學研究自然過程的必要性，認爲這是揭示自然地理規律以及進行研究這些問題的基礎。A.A.格利高里也夫院士在“哲學問題”上承認了和批判了自己的錯誤，由此也提出了許多新的論點。

在討論過程中正確地批評了在某些蘇聯自然地理學家之中流行着的所謂“景觀學派”的觀點，

這個學派的追隨者們不去深入地研究我國各個部分的複雜的自然發展過程，反而局限於景觀的描述。他們用“動植物分佈的”（純粹空間的）組合來代替地理環境中的複雜過程和現象的相互聯系。

И.П.格拉西莫夫院士在說到“景觀學派”的危機時，曾正確地指出：“‘景觀學派’在方法上有缺陷，所以不可能昇到更高的描述水平，而且還硬要遵從十分勉強的動植物分佈的概念，這些都是它目前狀態下的基本缺點。這個學派不能向前看，不能提出將來的任務，也沒有我們科學發展的綱領。”（“哲學問題”，1951年第3期，177頁）

在討論過程中廣泛地提出了自然地理學和經濟地理學的問題，而主要注意力則集中在這兩門科學的最一般的理論基礎上，因為不解決原則性的問題也就不可能正確地解決其他的問題。

首先，討論的參加者們力圖確定自然地理學和經濟地理學是否成為獨立的科學，或者它們僅僅是“統一地理學”的兩個部分。因此提出了關於自然地理學和經濟地理學的對象，關於它們的理論基礎及其對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關係，關於自然地理學中的“景觀學派”，關於“景觀”概念的內容和科學性，關於普通自然地理學和區域自然地理學的相互關係，關於經濟地理學中的“區域學派”以及其他等等的一系列的問題。並且極為注意先進的俄羅斯地理科學中的唯物主義傳統的問題。

這次討論顯示出，在蘇聯地理學界至今還有人持有自然地理學與經濟地理學組成統一科學這一觀點。“統一地理學”的概念當時曾被赫脫納所宣揚，而現在還廣泛地散佈在外國的（特別是美國的）地理學家之中。

“統一地理學”的辯護者提出許多論據，例如引證科學對象的特點。Ф.Я.基林肯定說，地理學應該是統一的，因為它具有一個研究對象——社會物質生活條件，並且說除了地理學以外，沒有其他這樣的科學，能夠全面包括對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的全部綜合的研究（“哲學問題”，1952年第2期，237頁）。〔1〕

不必要證明，“統一地理學”不可能包括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的全部綜合。所有自然科學以及政

治經濟學和其他社會科學都是研究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的。“統一地理學”不可能代替所有這些科學。

“統一地理學”的擁護者也企圖提出自然地理學家和經濟地理學家之間合作的必要性來作為論據。當然，自然地理學家和經濟地理學家以及其他專家的合作關係必須竭力歡迎，但這並不是說，應該有一門結合着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統一地理學”。

這種觀點的擁護者堅持“統一地理學”，並且提出了自然地理學家和經濟地理學家工作方法上的共同性（例如，作為主要的研究工具之一的地圖、區域劃分、野外調查方法等）。同時還提出“為了解決共產主義建設中最重要問題，而必須辯證地把自然地理學與經濟地理學的資料結合起來”（“蘇聯科學院院報”，地理學叢刊，1952年第2期，73頁）的必要性來作為論據（Ю.Г.薩烏什金）。

如所周知，為了解決共產主義建設中最重要問題，不僅要利用自然地理學和經濟地理學的資料，而且還要利用許多其他科學的資料——物理學、化學、生物學、政治經濟學等等。但是，這決不能作為忽視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間的差別，並且把它們混合起來的根據，正如Ю.Г.薩烏什金所作的。

有人企圖引證共同的野外調查方法、地圖工作等來替“統一地理學”辯護，這同樣是不嚴肅的。地圖工作不僅在自然地理學和經濟地理學中具有重大的意義，而且它還在地質學、考古學、歷史學等研究中廣泛地應用着。野外調查方法也是一樣。但這並不能作為把地質學和考古學等等統一起來的理由。

“統一地理學”的擁護者顯然過高估計了地理環境的作用，並且把社會發展規律與自然發展規律混同了起來。

“統一地理學”的概念，無論對自然地理學或是經濟地理學都是有害的，因為它使這兩門科學的工作者走上不正確的研究道路。這特別是指從事研究經濟地理學問題的學者。這種概念僅能使他們無從認識以客觀經濟發展法則來指導自己研

〔1〕編輯部接到Ф.Я.基林一封信，他認為對他在這個問題上的觀點的批評是正確的，並請求在刊物上予以披露。

研究的必要性。這種概念並且在經濟學和經濟地理學之間建立了人爲的牆壁。

某些蘇聯地理學者企圖用創作地誌著作的必要性來替“統一地理學”作辯護。地誌書描述我們對事物的知識，是很有用的，也是很必要的，但它畢竟不能代替自然地理學或經濟地理學。這種論據本身就包含着取消自然地理學和經濟地理學的傾向。

總結目前的討論，自然地理學和經濟地理學是兩門獨立的科學，這一原則應該認爲是正確的。而且十分顯然，自然地理學是自然科學，而經濟地理學是經濟科學。這次討論的絕大多數參加者都同意這一結論。在蘇聯科學院地理學研究所學術委員會的會議上曾正確地指出，自然地理學與經濟地理學不可能結合成爲“統一地理學”，因爲自然地理學屬於自然科學，而經濟地理學屬於社會科學。

同時必須着重指出，研究區域綜合的國民經濟問題的實際經驗證明了自然地理學家與經濟地理學家密切聯系的必要性。

在討論過程中，大家也非常注意自然地理學或經濟地理學的對象問題。

自然地理學是研究作爲統一整體的地理環境的科學，這一對象的定義還需要進一步的闡釋和研究。但它已可以作爲解決自然地理學在其他科學（首先是它的鄰近科學——地質學、土壤學、植物學、動物學等等）中的地位問題的基礎。

在自然地理學基本理論問題——研究整體的地理環境的問題——的研究中，複雜的和各種各樣的任務正擺在自然地理學的面前。其中主要的是揭示整體的地理環境的特點、它的結構的形成以及地理現象發展的規律。

必須指出，與“動植物分佈的”——唯心主義的、反動的赫脫納觀念作鬥爭，絕不等於否認研究自然地理過程和現象的規律性的空間表現的必要性。

在經濟地理學所討論的問題方面應該指出，某些討論的參加者，例如 Ю.Г. 薩烏什金教授及其他學者，實質上企圖否認經濟地理學屬於經濟科學之列。

薩烏什金教授指出：“經濟地理學不是研究

生產配置和社會歷史，而是研究在它上面展開着社會歷史、發展着各個國民經濟部門並配置着生產的地區本身”（“蘇聯科學院院報”地理學叢刊，1952年第二期，72頁）。

如果斷言經濟地理學的對象是“地區”，而不是社會生產的地理配置和經濟區域，那末在本質上就是意味着闡割經濟地理學的基本內容，從而取消作爲科學的經濟地理學。

討論的參加者提出了許多經濟地理學對象的定義。其中最可以接受的經濟地理學對象的定義應該認爲是：它是研究生產的地理配置以及各國和各地區間生產發展的條件和特點的科學。

這個定義是最正確的，因爲經濟地理學是研究與各國、各地區間社會勞動分工密切相聯系的各種問題的科學。同時必須考慮到，生產力的地理配置的基本規律決定於物質資料的生產方式。

在討論過程中，經濟地理學中所謂的區域學派遭受了正確的批評。區域學派不但不使區域同部門正確地配合，不但沒有使馬克思主義方法論同資產階級經濟地理學方法對立起來，反而反對了部門統計學派（當時爲傑恩教授所提出），並把部門同區域的對立作爲自己的觀念的基礎。

正如在討論論文中所正確指出的，藉助於區域式的或部門式的研究方法是決不可能解決經濟地理學的問題的。假如它們兩者都是真正科學的，那末它們對於共產主義建設的實踐將會是很重要的。可是“區域學派”的代表者沒有用物質資料的生產方式來說明經濟區域的形成和發展的趨向，而首先是用自然條件來說明經濟區域的形成和發展的趨向的，並認爲自然條件起着頭等重要的作用。區域學派的擁護者忽視了社會生產發展的客觀規律，過分誇大了各個區域的地理特點，低估了全國範圍內社會生產地理配置和經濟區域發展之間的相互依賴性。自然條件在經濟區域發展中雖然起着巨大的作用，但這種作用不是決定性的。

區域的特點也是如此。它們本身是十分重要的，但只能給一定地區的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作補充。

“區域學派”的代表者斷言，區域的描述似乎就是作爲科學的經濟地理學的主要對象，因而忽視了對生產的地理配置的客觀規律進行研究的必

要性。可是，全國工業與農業的主要部門的配置對一切經濟區域的生產力發展來說是最根本的，由此更顯出了“區域學派”的錯誤。

同時，還必須指出暗中以無的放矢的社會學化來代替經濟地理學的深入研究的危害性。討論中正確地指出，地理科學領域內科學工作的最大缺點，首先是遠沒有充分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很少結合共產主義建設的實踐，也沒有很好地研究和總結有關蘇聯國民經濟體系中豐富的社會主義生產配置的經驗，經濟區劃的經驗以及各共和國和經濟區域的發展的經驗。

對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地理學的研究進行得很不令人滿意。對於美、英帝國主義理論家們所宣揚的經濟地理學中的現代偽科學理論也揭發得不够。他們用對於蘇聯及民主陣營國家的人民的誹謗來代替科學，並企圖藉助於庸俗的地理主義、地緣政治學和種族主義來為美帝國主義爭奪世界霸權、企圖完全奴役殖民地國家和附庸國家的行動提出“科學的論據”。

經濟地理學最重要的任務是科學地解決改善蘇聯國土上新建設的地理配置的問題以及綜合發展我國主要經濟區域的問題。第十九次黨代表大會的指示中指出，必須改善新五年計劃中工業企業建設的地理配置，從而使工業接近原料和燃料產地，並且消滅不合理的長距離的運輸。為了完成這個任務，研究區與區之間的經濟聯系及其合理化的道路，研究我國各個經濟區域中經濟的綜合發展的基本問題，就有了頭等重要的意義。

馬林科夫同志在第十九次黨代表大會上所作關於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工作的總結報告中指出，要使科學家集中力量更加迅速地解決有關利用我國豐富天然資源的各種科學問題。號召自然地理學和經濟地理學方面的專家在解決這些問題的工作中起巨大的作用。在解決進一步發展蘇聯農業，擴大生產對於提高我國勞動者物質福利有重大意義的日用的食品和工業品的問題等方面，他們可以用自己的研究工作給予共產黨和蘇維埃政府以重要的幫助。

進一步發展農業的最重要條件之一是：不僅在全國範圍內，而且也在每個共和國、州、省以及其他行政區域內改善它的地理配置。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9月和2—3月的全體會議提出了

根本改善農業區域配置的任務，根據會議的決定，蘇聯科學家斥責了不考慮我國各地區的經濟特點和自然特點，一味死板地應用草田輪作制的辦法。研究各個區域農業發展的土壤、氣候以及其他自然條件的自然地理學家可以在改善農作物分佈和農業區域方面給予很大的幫助。

地理學家能够而且應該用自己的研究工作來協助解決這些全國性的問題，例如烏拉爾、西伯利亞、哈薩克斯坦地區以及我國其他各省、區的生荒地與熟荒地的利用問題。

地理學家也應該以考慮各個區域的經濟條件和自然條件的特點為基礎，在農業配置以及工業與運輸業配置合理化方面給予幫助。

共產黨及蘇維埃政府所擬訂的迅速增加國民消費品生產的計劃，規定了在最近幾年內建立成千個新的輕工業和食品工業企業。這些企業在各共和國、州和省中的合理配置是有關於這些企業建設中投資的節省、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以及原料和製成品運輸的合理化的很重要的條件。

蘇聯經濟地理學家和自然地理學家能够在解決這些極關重要的問題中給予很大的幫助。

自然地理學和經濟地理學應該幫助解決蘇聯國民經濟中最重大的問題。按照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9月和2—3月全體會議的決定，必須深入研究各個區域的自然（主要是土壤、氣候的）條件和經濟條件，特別是那些開墾大面積的生荒地和熟荒地的區域。只要深入地研究這些地區的特點和潛力，自然地理學和經濟地理學方面的科學家們就能在解決增加國家糧食儲藏的問題中給予蘇維埃政府以巨大的幫助，並且在迅速提高集體農莊的經濟和增加集體農莊莊員的收入方面給予集體農莊和集體農莊莊員以巨大的幫助。

在經濟地理學方面，必須開展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力的地理配置規律的研究，以及社會主義生產配置對於資本主義配置的優越性的研究。

“哲學問題”編輯部總結了這次討論，但決不認為已經最後解決了自然地理學和經濟地理學的理論上的問題。這些問題應該繼續在專門科學機關中和機關刊物上積極地進行討論。

〔葉 蒸 譯自蘇聯“哲學問題”
1954年第5期〕